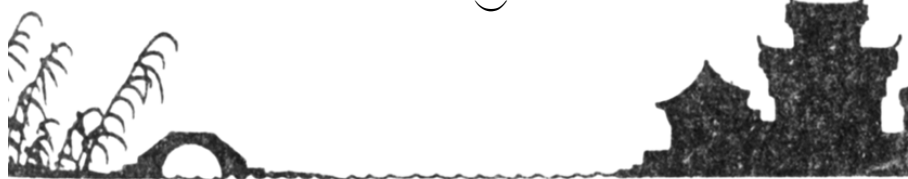


历史转折时期的政要名人传（十二）

闫新编著



目 录

宋教仁	1
陈其美	26
蔡锷	41
冯玉祥	68
袁文才、王佐	119

宋教仁

宋教仁（1882—1913），湖南桃源人。1904 年与黄兴、陈天华等创立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1905 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积极促成上海、江苏等地起义和筹建临时政府。1912 年 8 月参加改组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1913 年 3 月国会开会前夕，被袁世凯派人刺杀。

同盟会改组时期

本来，在南京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占绝对的优势，待到临时政府迁北京，参议院也进行了改选，同盟会已不占优势，由于共和党与袁世凯的两面夹击，同盟会常处下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加快了组织大党的步伐。

到了北京任职内阁后，宋教仁立即开始实施他的政党政治理想。他对随他到北京的湖南籍革命党人仇鳌说，他“对农林也是外行，不想久干。中国要想走上政党政治的前途，须借报纸鼓吹”。于是，他让仇鳌等人办起一个新报《亚东新报》，仇鳌任社长，易象任总编辑。宣告宗旨为：“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巩固共和政体，注重民国主义。”该报于 6 月 13 日出版。

据仇鳌回忆，报纸除了报导中外消息外，其主要内容就是宣传政党政治。宋教仁还常以“桃源渔父”的笔名，在《亚东新报》上发表长篇论文。这份发行量虽然并不很大的报纸，在宣传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方面很可能是非常突出的。与此同时，很大程度上受宋教仁影响的《民立报》也用相当多的篇幅刊载有关政党的评论文

章。

同盟会改组的事，7月初就已见诸报端。7月5日，《民立报》刊登的一则消息写道：“同盟会拟改为纯粹政党，更名民主党。几天后，胡瑛在职员会上提议改组，但同意者少，反对者多，胡竟因此辞干事职。

7月14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会上代理总务干事魏宸组提议“改定名称，组织完全政党”，但多数人不同意。特别是宋教仁的好友白逾桓、田桐等人，也“痛陈同盟会系数十年流血所成，今日当以生命拥护此名与民国同休，奈何提及改组？”最后决定在下一个星期日的本部大会上再行表决。

7月中旬，发生了陆内阁风潮，在这次风潮中，统一共和党一反过去骑墙的态度，与同盟会站在一起。7月22日，两党甚至一起发表公电驳斥共和党。这给两党合并带来了美好的前景。

7月21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夏季大会。宋教仁在会上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政事部主任干事由张耀曾接替。宋教仁担任总务部主任干事，可能是事先已经协商好了的。由于总理、协理都不在北京，同盟会本部事务是由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的。虽然此次大会没有通过改组的决议，但是由于宋教仁的当选，显然改组扩党的步伐加快了。

宋教仁首先取得了孙中山和黄兴的支持，接着又取得了同盟会沪机关部的赞同。8月10日，同盟会本部召开职员会，宋教仁首先宣读了孙中山、黄兴和沪机关部建议改组的来电，然后才谈与各小党谈判的情况。这一次，合并改组的提议终于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并推举出张继等人为交涉委员，与统一共和党及其他小党谈

判。

改组之所以获得多数同意，与孙中山和黄兴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即将进行国会选举。从7月份起，参议院一直在讨论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8月10日，公布了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随后确定11月10举行初选，11月30日举行复选，然后召集正式国会。要想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同盟会必须扩大，与同盟会接近的其他小党也谋求合并，因此，加快了各党联合的步伐。

8月初，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已与统一共和党进行合并的交涉。报载“统一共和党近屡密议与同盟会合并事，闻已得多数赞成”。

在合并的谈判过程中，统一共和党提出了3项条件：1.变更同盟会名义；2.废去民生主义；3.改良内部组织。宋教仁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孙中山和黄兴，得到二人的许可，于是由同盟会政事部主任干事张耀曾拟定了一个党纲草案。8月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的代表13人谈判。各党商定新党的名称为国民党。会上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反对草案中的“保育民生”四字，经过同盟会代表的力争，将原党纲草案中的“巩固共和，保育民生”改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策”，而把政纲第四条的“采用社会政策”改为“采用民生政策”。

8月11日，各党在安庆会馆召开筹备大会，这时又有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两小党加入。会议确定了各党合并办法和步骤，设立筹备事务所具体负责，各党分别通告自己的支部。筹备大会还推举宋教仁、张耀曾和国民公党的张南生草拟宣言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国民党宣言》。8月13日，孙中山和黄兴联名通

电各支部，要求赞同改组。8月14日，同盟会本部致电各支部通知改组。在国民党准备召开正式成立大会的时候，全国联合进行会也愿加入，国民党欣然同意。所以，如果准确地说，不是一般资料和著作所说的5党合并，而是6党合并。

8月24日，孙中山来到北京，他正好赶上国民党于8月25日召开的正式成立大会。孙中山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会上选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贡桑诺尔布9人为理事。宋教仁是以仅次于孙中山、黄兴的票数当选的。后来，又选出胡瑛、温宗尧、陈锦涛、张继等30人为参议。至9月初，国民党各理事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又命宋教仁代理理事长。

为了说明国民党的情况，我们介绍一下参加国民党的其他党派的情况。

统一共和党

统一共和党是参议院中的第三大党。1912年4月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成立。当时选举蔡锷、张凤、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堃为总务干事。殷汝骊、袁家普、陈陶怡、张树森、彭允彝为常务干事，景耀月、刘彦、欧阳振声、沈钧儒、肖 等20人为参议。统一共和党宣称它的宗旨为“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统一共和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同时又是同盟会员，如孙毓筠、沈秉堃、景耀月、沈钧儒、刘彦、欧阳振声等。统一共和党本部由南京迁到北京后，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全院委员长谷钟秀渐成为该党主要人物。

吴景濂，辽宁兴城人，曾留学日本。1909年任奉天

自治会会长、奉天教育会会长，1911 年任奉天谘议局议长。武昌起义后，参与成立奉天保安会，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会长，吴任副会长。不久由于张作霖的压迫离奉赴沪，代表奉天省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临时参议院开院后为参议员。1912 年 5 月 1 日当选为参议院议长。国民党成立后当选为 9 理事之一。

谷钟秀，直隶定县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教员、谘议局议员。武昌起义后南下上海，代表直隶省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临时政府成立后为参议院议员。工芝祥督直问题发生后，曾与同盟会持同一意见。国民党成立后，当选为政事部主任干事。

就历史来说，吴、谷二人都属清末立宪派，并且是武昌起义后迅速响应革命的人。此外，各党讨论合并时，本拟推举蔡锷为理事，但蔡锷认为当时需要强化中央集权，不同意限制袁世凯权力，并主张解散各政党，因此在 8 月中旬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加紧讨论合并时，登报声明脱党。

在参议院中，统一共和党占有 25 席，其地位举足轻重。它的政治态度时而偏向共和党，时而接近同盟会。因为陆内阁风潮，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日益接近，并开始赞成同盟会的政党内阁主张，两党因之得以合并。

国民共进会

国民共进会系王宠惠、徐谦等人于 1911 年 11 月在天津发起，推伍廷芳为会长，王宠惠为副会长。12 月，王宠惠离津赴沪，会务由徐谦负责。1912 年 3 月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

王宠惠，出生于香港，少年时代就认识孙中山。1901 年留学日本学法政，后又留学欧美，精通法学，获美国

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04 年，王宠惠协助孙中山用英文撰写《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5 年加入同盟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外交总长，继又任唐绍仪内阁司法总长。唐绍仪辞职后，王宠惠与宋教仁、蔡元培一同辞职。国民党成立后，为 9 理事之一，得票仅次于孙、黄、宋。

徐谦原为清政府京师高等审判厅检察长。武昌起义爆发时，适从国外考察回国不久，徐谦辞职并上书请清帝退位。后任唐绍仪内阁司法次长。徐谦是国民共进会的实际主持人。国民党成立后，当选为参议。

由于王宠惠的关系，国民共进会与同盟会比较接近，它曾提出北方各省都督一律仿效南方采取“民选”，以预防官僚政治复古，引起袁世凯的不满和恐慌。

共和实进会

共和实进会的发起人是晏起，1912 年 2 月 24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

晏起，江苏仪征人，武昌起义以前曾在北京进行秘密反清活动。武昌起义后，曾与董之云、许廉等人密谋响应。清帝退位后，组织共和实进会。

当建都之争正激烈之时，共和实进会曾支持建都北京。不过，它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袁世凯，例如共和实进会曾主张责任内阁制，后来又支持同盟会的政党内阁主张。由于共和实进会是一个不满百人的小党，又缺少著名人物，影响不大，便积极谋求与他党合并。国民党成立后，共和实进会的王绍祖、夏仁澍、许廉被选为备补参议。

由于共和实进会没有人当选为国民党的理事和参议，非常不满，在孙武的拉拢下，于 1912 年 9 月 2 日再

行宣布独立，并改组为“群进会”，拥护袁世凯。但是群进会的发起人晏起则对袁世凯不满，并图谋反袁，因而于1913年秋在天津被袁世凯密令杀害。

国民公党

国民公党的前身是中国共和研究会，1911年11月发起于上海。顾名思义，中国共和研究会声称它是研究共和问题，启迪民智，“将专制积习自然消弭于无形，而达共和目的”。1912年3月，改名国民公党，推举岑春煊、伍廷芳、程德全为名誉总理，王人文为总理，温宗尧为协理。其政纲为：“一、实行平民政治；二、整理地金，减除苛税；三、尊重法律，拥护人权；四、调剂国用，休养民力；五、提倡国民外交。”

王人文，字采臣，云南太和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四川布政使。1911年1月四川总督赵尔巽应召进京，由王人文护理总督。因在保路运动中同情四川绅民，弹劾盛宣怀，王人文虽被清廷革职，却因此赢得了声誉。国民党成立后，为9理事之一。

温宗尧，广东人，香港皇仁大学堂毕业。历任两广洋务司总办，两广电报局总办，广东电话局总办，广东将弁学堂总办，驻藏帮办大臣，两江总督外交顾问，参与立宪派的活动。武昌起义后，与伍廷芳一起被推定为民军方面的外交代表，随后又担任议和参赞。后来并入民主党的国民协会成立时，温宗尧曾被选为干事总长，但不久在《时报》上声明辞职。国民党成立后，温宗尧当选为参议。

1912年六、七月份，国民公党谋与统一共和党合并，因统一共和党又谋与同盟会合并，遂一起与同盟会谈判合并。国民党的9个理事，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

人文、王宠惠、王芝祥、吴景濂 7 人本书都已介绍过了，这里再介绍一下张凤和贡桑诺尔布。

张凤，陕西人，中过秀才。1904 年到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先后入士官学校和振武学校。在日期间，张凤曾加入过同盟会，但并没有参加过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回国后在新军中任职，与同盟会革命党人交往颇密。武昌起义爆发后，任陕西新军第三十九混成协司令部参谋兼二标二营管带的张凤，受革命党人和新军推戴，任起义军总指挥，于 1911 年 10 月 22 日率陕西新军起义，这一天，长沙也宣布独立，这是两个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陕西军政府随即成立，张凤先任“秦陇复汉军”大统领，于 12 月正式任“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统一共和党成立时，张凤被推为总务干事，并任陕西支部部长。张凤任国民党理事，主要是出于统一共和党的推戴，但他并没有过问实际党务，二次革命时，张拥护袁世凯。

贡桑诺尔布，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他是在他的父亲 1898 年去世之后担任这个职务的。在近代中国史上，蒙古本是比内地开风气更晚的地区，但贡王则颇具新思想。1901 年以后，贡王在他的统辖地区推行新政，练新军、办学堂、办报纸、创邮电。1903 年，未经清政府许可，贡王私自到日本进行考察和访问，回国后明显亲日。他开办武学堂，请日本人为教习，并让学生普遍学习日语，还选派一些人到日本留学。资政院成立后，贡王成为议员。武昌起义后，贡王曾企图在日本支持下分裂“独立”，由于向日本泰平公司购买的武器在运输途中被东北军队截获没收，没能发动。民国成立后为参议员。1912 年 9

月，贡桑诺尔布被袁世凯任命为蒙藏事务局总裁，他任此职长达 16 年。国民党之所以拉他入党并举为理事，是因外蒙在沙俄操纵下独立，形势紧张，含有联络蒙古之意。

实际上，国民党的 9 个理事多为名誉性的，孙中山和黄兴有很高的威望，宋教仁也尊重他们，但孙、黄此时的兴趣和主要精力放在实业建设上，不大过问党务。主持北京国民党本部的是宋教仁，宋教仁不在时吴景濂起较大作用。而王人文、王芝祥、张凤、贡桑诺尔布 4 人对国民党的党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地方实力派则为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和安徽都督柏文蔚，国民党的经费就大部分是由广东和江西两个省提供的。

国民党成立后，就其规模来说，确实达到了宋教仁的期望。在庞大的本部中，竟有 969 人。9 理事之外，设有参议 30 人，还有候补参议若干。理事、参议之外，设有 5 部 1 会：

总务部主任干事魏宸组、殷汝骊

交际部主任干事李肇甫、恒钧

政事部主任干事谷钟秀、汤漪

文事部主任干事彭允彝、杨光湛

会计部主任干事仇亮、陆定

政务研究会主任干事张耀曾、刘彦

各部在主任干事之外，还有一般干事，如政务研究会在主任干事之下有主管干事及干事 330 人；交际部有主管干事及干事 256 人。所以人数才如此众多。

地方上，按照国民党规约，在各省省会设支部，支部之下，在各府厅州县设分部。同时在重要城市如上海、汉口等地设交通部。为了便利选举，在复选举的地方设

分部联合会。另外，在海外一些地方也设立支部和分部。

国民党成立后，同盟会宁支部率先改组，到 1913 年 1 月粤支部改组，各地交通部、支部的改组全部完成。许多原来没有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支部的地方，也相继建立了国民党支部，连边远地区的内蒙，也由燕支部派人建立了分部。不过，国民党的主要势力，还是分布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等南方诸省。

国民党成立后，还吸收了其它地方性的小党以扩大自己的组织。如 1912 年 9 月，常州公民会并入国民党；1912 年 12 月，江苏国民公会全体加入国民党；1913 年 1 月，上海国民总会、工业建设会并入国民党。

至于党员总数，尚无确切的资料显示，仅浙江慈溪一地，就有党员 500 余人。估计全国可能有几十万党员。

政党政治中

1913 年 1 月 30 日，宋教仁到达武汉。这时候，各地选举的消息不断传来，国民党最终获胜是无疑的了。如果 1911 年底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时宋教仁想当总理是出于人们的误解和猜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宋教仁确实想当总理了，而且是当仁不让。与宋教仁关系密切的《民立报》，已经在为宋任总理造舆论。该报 1 月 26 日刊登的徐血儿写的《当今之政治家》中写道：

今日之政治家，求其有沉毅之魄力，运用之手腕，尤求其有系统之政纲，若宋教仁氏者，其庶几焉。宋氏于政治修养有素，厕身唐内阁时，即注意于大政方针，其行事颇有欧美政治家之步调，且能力持其政见，不稍屈挠，与政客之挟一说以鸣于时者绝不类。故宋氏者可谓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

然而，这时候的宋教仁已不仅仅满足于做内阁总理了，他试图把袁世凯赶下总统宝座，改由黎元洪代之。

宋教仁为了阻止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订年谱》中说：“袁公就职岁余，渐恣肆，克强甚畏恶之，欲因正式国会改选总统，然已亦不理众口。余谓宜推黎公，上书问其去就。会初亦与黎公成言，或言其有所要挟，机事不密，三月盗杀初于上海。……时人望多属黎公者，黎公以初死，惧及己，益惶惶。”

蔡元培为宋教仁的日记《我之历史》所写的序言中说，宋“以同盟会与其他三四政团相结合而组织为国民党，以为有此多数党为大本营，足以操纵袁氏。既而知袁氏终不足与有为，乃舍袁就黎，遂以此触袁氏之忌，而先生死”。

宋教仁被刺后的第6天，即1913年3月26日，湖南湘民公会开会讨论，宁调元发表演说：“诸君今日亦知绝大凶犯之所在乎？宋初与余订交十年，其生平余深知之，磊落光明，从无不可解之私仇。惟共和成立后，主张内阁制最力，深触袁氏之忌。近日且奔走东南，反对举袁为总统，袁之党欲得而甘心者久矣。遁初今日致死之媒在此，所谓绝大之凶犯即袁氏是也。……据兄弟意见，主张以消极的对付，即要求国会议员诸君勿举彼为大总统，庶足以巩固民国，慰宋遁初在天之灵。”

以上都是与宋教仁关系比较密切的人说的，下面再看其他记述：

北一辉说：“彼（宋教仁）组织国民党而成为实权总理，（国民党）占上下两院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策划即将选举之正式总统人选，……彼不推南孙，不愿北袁，

而默想第三者——最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

1913年4月13日，在上海张园为宋教仁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有潘仲荫发言：“大呼：杀宋先生者非他，袁世凯是也。（大拍掌）吾人继宋先生未竟之志，第一当不承认袁世凯为总统。”

当时的报纸也有不少这方面的报道。如：

《时报》1913年2月22日载《不公开之总统运动》一文，说黄兴、宋教仁“竭力推黎，其用意所在，欲以黎氏为虚位的总统，而本身则于其下掌握政权”。

当时的名记者黄远庸1913年2月26日发表的评论《政海之一勺》说：“国民党重要人之推黎副总统，则已成公然之事实，其事已具见各报。……关于运动黎氏为正总统之事，以记者之所闻，先有张继、曾昭文二君特别之推动，继之以黄兴、宋教仁二君之面谈。宋教仁氏且有黎氏为总统后，组织同志内阁，并以孙武为陆军总长之说，合以田桐等之主张，则此举可谓千里来龙，脉络甚远。”

宋案发生后，黄又在1913年4月2日的《春云初展之政局》中说：“据国民党议员所称，该党议员假道上海者，皆曾接洽不愿举袁。有一派人愿举黄，有一派人愿举黎，然黄实不顺，将以举黎者占多数。然黎又何尝情愿。今有宋案翻波作浪其中，不知作如何变迁也。”

1913年2月19日《申报》刊登一则消息：“南省所选国会议员列名国民党者，已奉驻京本部之示，将于赴京之前在沪聚集，以定该党对于将来选举正式总统、组织内阁各问题所遵守之政策”。而各省议员经上海赴京之际，正是宋教仁在上海逗留之时

1913年2月23日，共和党系的《时事新报》载《某

党近日大计划》一文：“黄兴、宋教仁二氏则极力耸恿黎副总统为正式总统之候选者。宋教仁且力劝黎氏，谓今日时局非公不可，望勿为官僚派所欺。”

1913年5月，袁系报纸《亚细亚日报》评论说：“运动总统，南派国民党先时只争政党内阁，本年来一转而争总统。黄克强自知众望不孚，自武昌总选举时，即极力耸恿黎副总统为正式总统，以与袁抗，为黎所拒绝。”

黎元洪后来也承认有人曾推举他任总统：“总统一席岂惟五洲耳目所关，抑亦全国身命所寄。……乃远道不察，颇有驰书垂问欲相推举者，虽不虞之誉出自众情，而无因之投，弥增隐痛。”

……

他的策划分两个方面：一是在国民党议会选举获胜的前提下，在选举正式总统时推举黎元洪，从而把袁世凯拉下总统宝座；二是尽可能争取部分原共和党、统一党甚至民主党人士的合作，最大可能地孤立袁世凯。推举黎元洪，有可能争取到拥黎的共和党中的原民社派孙武等的合作；拉谭延闿任内政部长，可能通过谭的关系争取一些原立宪派人士的合作。宋教仁到武汉时，大概和黎元洪暗中商议过，按照黎元洪的性格，是很难干脆答应的，含含糊糊不置可否是很可能的。过去，大陆学术界都以为袁世凯杀宋教仁仅仅是因为宋主张政党内阁，袁怕政党内阁的实现有碍他的独裁。其实比政党内阁的实现更令袁畏惧的，是正式总统的选举。因为当时议会竞选已经揭晓，国民党议席占了议会参众两院的绝对多数，如果没有武力威胁，要另选总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没有摧毁国民党军事实力之前，用武力威胁议会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宋教仁的这一计划是很厉害的

一着棋，如果袁没有当选总统，他就被动了。这也正是袁世凯决心杀害宋教仁的原因。正如袁的爪牙袁乃宽在致张镇芳的信中说的：“目下最讨厌者，即宋教仁一人。”

宋教仁于 1913 年 1 月 30 日到达武汉，2 月 1 日，国民党湖北支部、汉口交通部干部和国民党国会议员候选人开会欢迎，宋教仁发表了演说。演说的内容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开始了对袁世凯的攻击，并摆出了战斗的姿态，自信可取得胜利：“现在接得各地的选举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或许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其二是特别强调选举的重要性：“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疑，讲什么客气。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还努力维护孙中山的地位以求党内的团结，这在宋教仁的革命生涯中是很少见的，可以说是他成熟的表现。他说：“中华民国，是本党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不避艰险，不恤任何牺牲，惨淡经营，再接再厉，才能够缔造起来的。……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月6日，正好是旧历春节，宋教仁与好友田桐和记者蔡寄鸥等人冒着大雾乘船去湖北黄州(今黄冈)。此时湖北的初选举已经完毕，正在办理复选，宋教仁便是为选举的事到黄州的。宋教仁刚到黄州，就出席各界欢迎会并发表演说，“对选举意义及议员对人民所负的责任，作极诚恳的演说，并抨击袁世凯的一切阴谋。词意激昂，听众无不鼓掌”。宋教仁的活动已引起袁世凯的注意，据当时任总统府秘书的张国淦回忆：“各省办理选举，其选举人在各处言论登报者，由府秘书每日剪呈。宋在黄州演词，甚激烈，袁阅之言：‘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在黄州，宋教仁游览了著名的古赤壁。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贬居黄州，他在此写下了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和《赤壁赋》。后世学者虽已考证出黄州赤壁并非“三国周郎赤壁”，但因有苏东坡的词和赋，便和真正的周郎赤壁一样有名，人称“东坡赤壁”。在吟咏了苏东坡的词、赋后，宋教仁和好友同学田桐有一段颇有意味的谈话：

田：宋大哥来到黄州，安知袁世凯没有派出侦探，随你来到黄州。你公开演说，大骂袁世凯，一定会有人打电报到北京，报告袁世凯的。

宋：他也不是皇帝，我也不做他的官，怕他做甚。

田：你说他不是皇帝，我看准了，他一定要做皇帝。

宋：他要做皇帝，就是自速其亡了。历史是前进的，决不会开倒车。你放心，再不会有皇帝。

在黄州逗留了两三天，宋教仁一行再返回武汉。2月10日左右，国民党武汉交通部为宋教仁举行了欢迎会。在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宋教仁再次从内政外交两个方面抨击政府的失政，认为“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